

“20 世纪的中国学术”讨论会综述

为纪念《学术月刊》创刊 40 周年,《学术月刊》社于 4 月 10 日邀请沪上及外地专家学者 40 余人召开了“20 世纪的中国学术”讨论会。与会人士不仅就“20 世纪中国学术”的定义、研究方法及其性质等发表了各自的意见,而且还就 20 世纪中国学术在中西文化与学术的碰撞和融合的背景之下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与教训、部分具体学科在 20 世纪的发展脉络等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就“20 世纪中国学术”的定义来看,首先涉及的是“20 世纪”的时限断定问题。20 世纪始于 1900 年,有学者对中国学术史能否这样按照物理时间来进行机械的切割表示怀疑。不过也有学者认为,“20 世纪”对于中国学术而言,既是一个时间概念(指 1900 年至 1999 年的 100 年),又是一个时代概念(相对于传统或古代而言的现代),二者能够在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的基础上达成一致。所谓“中国”学术,有学者指出,由于学术本身是“一”而不是“多”,因此“中国学术”究竟是“中国的学术”还是“学术在中国”?如果不先行澄明这些前提性的条件,势必无法对 20 世纪的中国学术加以总结和反思。至于“学术”,有学者认为,必须明确将其与文化史、思想史以及哲学史等区分开来,把“学术”定位在知识形态上,即学术史主要是客观地研究知识的分类、构成、积累等问题,对知识的结构演变、体系的发展脉络予以发生学意义上的追寻,作出分析、说明、描述、勾勒,以此与文化史、思想史作出分疏,给学术史留出独立的位置,树立自觉的意识与确定的立场。

就研究方法而言,与会的学者大致持有以下四种不同的见解。其一,有学者主张应该在古今对照和中西对比中对 20 世纪的中国学术加以总体把握与整体反思,以求得其总体性质和基本特征。也有学者主张综合的研究应该以分析的研究为基础,即应该首先分门别类地依学科、流派、名家来整理 20 世纪的中国学术。其二,有学者认为应该运用“知识考古学”的方法,以概念与范畴的更迭为切入点,来对 20 世纪的中国学术加以把握和客观描述,同时不排除在这种客观“考古”基础之上的多元解释。与之相对,有学者指出,由于客观总是相对于主观而言的,个人所使用的语言总是受到社会的、主体间的东西(如意识形态等)的制约,因此,事实上不可能存在对 20 世纪中国学术的所谓“还其本来面目”的客观描述,研究者应首先反思自己的研究立场是否正确。其三,有学者认为应该运用“多元化”的研究方法来对 20 世纪的中国学术加以分门别类地整理,并指出以往研究各流派侧重其相互对立的一面,今后应注重其师承及其他关系。另有学者主张通过对学术共同体所共享的“范式”(尤其是主导规范)演变的把握去研究 20 世纪的中国学术史。其四,有学者强调,在回顾和总结 20 世纪中国学术时,不应该忽视研

究方法中的社会学维度,即对学术发展的外部环境如运行机制和管理机构等加以分析。

关于 20 世纪中国学术的基本性质,大致存在着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 20 世纪的中国学术基本上是一种现代的学术,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以乾嘉学派为代表的传统学术的“求实”精神向现代学术的“求真”精神的转变。“求实”强调经世致用、要求回到元典、注重方法论,但经学本身不可能为其发展提供空间。而导源于近代西学东渐的“求真”,即黜伪崇真的精神,验之以物的方法和运用体用不二来对待中学和西学,不仅突破了经学规范,拓宽了学术研究的空间,而且促进了现代学术机构的建立和学者共同体的形成。因此,求实归属于经学的规范,求真是科学的规范,真实之辨,乃是传统与现代的分殊。其二,20 世纪的中国学术获得了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类或学术分类,这是现代学术从经学体系中独立出来的一个重要的标志。这一源头可以追溯至 19 世纪下半叶以张之洞《增设洋务五学片》为开端的、与义理考据辞章的制义帖括旧学相区别的中国现代学术分类。

第二种意见则认为,20 世纪中国学术尚未取得现代性。被我们当作现代的东西,其实大多是西方近代史意义上的成果。在学术上,东西方存在着明显的时差,在对 20 世纪中国学术的性质作出判断时,须正视这一事实。就中国哲学来说,五四时代及其以后的中国哲学仍然属于古典形态,问题陈旧,体系落后。一段时间以来,超越实践本体论成为热门话题,但取得的成果可以说还没有达到南斯拉夫实践派的水平。中国的美学受苏联学术界的影响极大,对于所谓的主观派、客观派、主客观统一派和实践派,急需一个“范式的转化”。而在文艺理论方面,整个理论框架也是前现代的,需要突破和超越。

第三种意见认为,20 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实际上是对西方 19 世纪的近代文明和 20 世纪的现代文明以及后现代文明的磨合,表现为前现代或传统的思潮、现代的思潮和后现代的思潮始终相互交织在一起,而合理的解决是立足于当前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现实,以对现代性的追求为主,同时用现代性的价值对其余二者的合理部分加以创造性地转化。

二

从总体上看,20 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是在中西文化和学术的碰撞与融合的制约之下展开的。因此,从中西文化和学术的碰撞与融合的角度去评价 20 世纪中国学术的总体特点和存在的问题与教训也就成为与会学者的一个热门话题。

有学者指出,由于中西文化和学术在中国大地上的碰撞,一方面造成整个 20 世纪的中国社会历史进程本身为一系列的悖论所困扰,如救亡与启蒙的悖论、功利主义与大同理想的悖论、东西文明既相吸引又相排斥的悖论、传统和现代化的悖论等等;另一方面又使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预设了进化论主义、逻辑主义、实用理性和泛道德主义等,它们往往导致把对对象的研究还原为对对象的历史的研究,用逻辑去统一历史和裁剪生活等问题,从而导致当代中国学术思维只重历史追索、缺乏创新见解;深受统一模式的影响,且带有经验主义与泛道德主义的局限。

有学者认为,20 世纪的中国学术在中西文化和学术的碰撞与融合中表现出理性主义与反理性专制并存的特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西方科学精神的引入,促进了中国人的理性思考和逻辑分析的思维方式的发展,冲破了经学独断和文化蒙昧。但是对理性的崇拜又往往导致理性专制和教条主义,因此,伴随着理性崇拜又始终存在一个反理性专制的运动,如胡适对思想自由的提倡、毛泽东对本本主义的反对以及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评等。理性崇拜和反理

性专制这两个在西方是时间上相更迭的东西,却在 20 世纪的中国同时并存,其目的都是为了思想解放和自由思考。

当然,发生于 20 世纪的中西文化和学术的碰撞与融合也有着不少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尽管 20 世纪中国学术的一个总趋势就是向世界开放,引进各国学术,但是,由于时间滞后、空间换位而导致西方的学术和思想在引进中国之后有所误读而造成变形和失真,如以激进批判西方中心论为主旨的后殖民主义在中国却有导致国粹主义、东方主义和斯拉夫主义的危险。也有学者指出,20 世纪的中国学术尽管引进了众多的西方学术观点,但是对其蕴涵于观点之后的方法却往往在理解与把握上出现较大偏差或有意无意地不予重视,所以,西学的输入实际上是盲目引进。典型的例子就是用西方的“框框”来套中国,如认为中国传统哲学有本体论;如用西方的语法学硬性建构起一套汉语语法等。因此,在反思 20 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历程时,一方面应该对近百年以来的西方学术的发展有一真正的了解,另一方面则应在此基础上走出西方中心论,反思以西方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学问其作用之有限,反思这条路是否应一直这样走下去。也有学者认为,中西文化与学术的融合,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它是一个长远的历史的过程。从历史的经验说,佛学自东汉进入中土,对中国学术产生过重大影响,但直到一千年后的宋明理学,才算被中国文化与学术真正吸收与融合。因此,20 世纪只是与西方文化交流的开端,离真正的融合还远,学术上更不宜滥施苛责。

马克思主义作为西学的传入及其中国化是 20 世纪中国学术发展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就 20 世纪中国学术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政治的关系来看,也有许多教训值得吸取。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既是政治原则又是科学理论,如何防止对马克思主义作教条主义的理解、如何正确对待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等等,一直是困扰中国学术界的难题。回顾 20 世纪中国学术所走过的路,必须大力提倡思想解放、自由思考。同时,就学术研究和现实政治的关系来说,我们一直强调学术为政治服务,然而事实上,学术研究必须崇尚求真务实。早在 20 世纪初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中,严复、王国维等把学术看作有独立的价值,学术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对现实具有无用之用,即超越现实功利的大用。因此,“学术为政治服务”这种提法本身就存在内在的矛盾。也有学者指出,在 20 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历程中,对马克思主义作教条主义理解无助于学术研究的发展,同时,把马克思主义视作唯物的唯科学主义也有害于学术研究的健康成长,因为后者所主张的意识形态的大一统势必要求用科学主义去清洗不同的学术规范和学术传统。

有学者强调,所谓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和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就是指一方面要真正地把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用来指导我们的学术研究工作,另一方面要敢于冲破旧的框框,反对教条主义。在对待中国传统学术和西方学术的问题上,20 世纪的中国学术在其发展过程中还没有形成自己的选择标准、吸收框架或价值体系。不过,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是一个突破——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又没有原封不动地照搬西方的思想和观点。可以这样说,当代中国的价值体系可以在邓小平理论中找寻到基本的原则。

三

在这次讨论会上,也有部分专家学者分别就若干具体学科在 20 世纪的发展历程作了回顾和总结,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有学者指出,20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使得人们逐渐对历史地理作为一门新学科的性质形成了共识,并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历史地理的教学和科研的机构,完成了若干项重大的研究课题,对于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促进祖国统一、加强环境保护与国土整治、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地理环境因素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还没有形成一个正确的认识,科学研究与为现实政治、国家利益服务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得到妥善的处理,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和历史自然地理研究之间尚存在不少差距,急需加强对全球有重大影响的人口、灾害等课题的定量化研究。

有学者认为,20世纪中国文化史的研究的主要成就在于,一方面文化史的研究从传统史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新的独立的学科,从而拓宽了史学的研究范围;另一方面,文化史的研究与现实联系紧密,对于重建民族认同、激励民族自信、回顾中国文化的历程、预测未来发展的命运、回答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都作出了贡献。不足之处则表现在文化史研究的对象和范畴还没有得到确立,往往导致文化史研究被泛化;文化史研究与文化学相脱离,缺乏自己的方法论;中国的文化史研究对于国外的文化史研究成果的借鉴还很不够;同时,文化史的研究还必须注意的问题是不能仅仅通过对中国文化的辉煌的过去的研究来论证中国文化未来的辉煌。

有学者指出,在20世纪的中国学术界,由于唯科学主义长期占据了上风,使得人文学科的引入及其发展始终受到压抑。二三十年代人文学科还有一定的繁荣,但在40年代以后遭到打击,其原因在于唯科学主义在受到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影响之后成为了一种所谓的唯物的唯科学主义,对关于人的存在、活动及其意义和价值进行阐释的人文学科给予了科学主义的清洗和独断论的限定,即使这种阐释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进行的也是不容许的。70年代末以来,随着拨乱反正的开展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以及对十年动乱的反思,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引发了一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大讨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人文学科才获得了解放。当然,对唯物的唯科学主义的批评并不意味着走向唯人文主义。

也有学者回顾了中国近现代的名辩学研究,认为注意20世纪中国学术存在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比总结已经取得的成绩更为重要。以名辩学的研究为例,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如在古籍的辨伪问题上);在新的概念工具的引入上不求甚解,对文本的分析和理解牵强附会、主观随意性过强;对前人的研究成果注意不够,重复劳动现象较突出;中西名辩学的比较研究带有只注重以西解中而不注意以中释西、只顾在比较中求同而忽视求异等等片面性。

(晋荣东)